

关于《史通·探赜》的三重探赜

刘 开 军

文有文心,诗有诗心,史亦有史心。先秦时人已具有“探赜”精神,开始注重探究史家的思想世界,揭示作史的曲直、意图与诉求。而自刘知幾撰《探赜》篇始,“探赜”从一个常用词语演变为史学概念。《探赜》在《史通》一书中,居于《鉴识》之后。从学术范畴上看,《鉴识》与《探赜》都是讨论史家认识论的文章。精于编次之道的刘知幾,让它们前呼后应,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在一般的阅读体验中,《探赜》似不如《六家》《二体》《本纪》引人注目,也不像《直书》《曲笔》《浮词》那样让人由篇名就能想到所要言说的主题。《探赜》篇给人的初步感受总有点生僻与晦涩,这恰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 “探赜”释义

何谓“探赜”?专门为《史通》作注的乾嘉学者浦起龙有过这样的解释:“此篇亦非论史,是论论史者……字书云:赜通‘啧’。然则探赜者,探众论之啧有烦言,而辩正之也。”(浦起龙:《史通通释》卷七《探赜》按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浦起龙强调“探赜”乃是辩正“众论之啧有烦言”。从《史通·探赜》的内容来看,该篇主要是刘知幾反驳孙盛、葛洪、李德林、檀道鸾、魏收诸人论史之说,即“论史”。浦起龙的解释算得上自圆其说,但却陷入了就事论事。事实上,“探赜”的内涵远比浦起龙所言丰富且广阔得多。

先来看看浦起龙之前的经史注家是怎样理解“探赜”的。《周易·系辞上》有云:“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这当是“探赜”一词在古代典籍中的语义源头。孔颖达等注解:“探谓窥探求取,赜谓幽深难见……索谓求索,隐谓隐藏。”(孔颖达等:《周易正义》卷七《系辞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这已是精细到毋庸多言的界说了。受《周易》的影响,后世文献中,“探赜”常与“索隐”连用,又惯于和“钩深致远”组合,成为有关探索幽隐之义的经典表达。至东汉,《汉书·律历志》仍加以援引,称:“推历生律制器,规圜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唐代的大学者颜师古对此注曰:“赜亦深也。索,求也。”(班固:《汉书》卷二一《律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56、957页)稍晚,李贤等为班固的“铺观二代洪纤之度,其赜可探也”作注时,也称:“赜,幽深也。言遍观殷周大小之法,其幽深可探知之。”(范曄:《后汉书》卷四〇《班固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78~1379页)可见,诸家对“赜”的辨析大致相同,揭示出“探赜”的基本意涵。

不过,从概念史角度来看,汉魏以降,“探赜”在用法与意趣上还是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即开始用来表示人的才华与能力。东汉末年的胡广“博物洽闻,探赜穷理,《六经》典奥,旧章宪式,无所不览”(范曄:《后汉书》卷四四《胡广列传》,第1508页)。曹魏时期,杜宽“敏而好古。以名臣门户,少长京师,而笃志博学,绝于世务,其意欲探赜索隐,由此显名”(陈寿:《三国志》卷一六《魏书·杜恕传》,裴松之注引:《杜氏新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8页)。《魏书》记胡叟批评其时的学风:“先圣之言,精义入神者,其唯《易》乎?犹谓可思而过半。末世腐儒,粗别刚柔之位,宁有探赜未兆者哉。”(魏收:《魏书》卷五二《胡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49页)这些论说主要是讲人在探赜上的意愿与实践。

明确将“探赜”与史学对接并使之成为一个史学概念,当归功于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先是,《隋书·经籍志》的作者“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又自谦“未能研几探赜,穷极幽隐”(魏征:《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08页)。随后,“遍居司籍之曹,久处载言之职”[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史通原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下文简称浦起龙通释本)]的刘知幾作《史通·

探赜》，将“探赜”一词引入史学批评领域，赋予“探赜”更为明确的史学概念属性。不仅如此，除了《探赜》篇，刘知幾在《史通》其他篇章中还多次使用“探赜”。《史通·自叙》批评范跋、刘歆只看重扬雄的文采，至于《太玄》这样深奥的著作，因“理难探赜。既绝窥逾，故加讥诮”（《史通·自叙》，浦起龙通释本，第272页）。《补注》篇感叹刘孝标“不能探赜彪、嵒，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史通·补注》，浦起龙通释本，第123页）。《暗惑》篇说“精《五经》者，讨群儒之别义；练《三史》者，征诸子之异闻。加以探赜索隐，然后辨其纰缪”（《史通·暗惑》，浦起龙通释本，第552页）。从这些举证中可以确定，刘知幾笔下的“探赜”多事关微言大义、思想要旨。刘知幾如此频繁地以“探赜”论史学，当非偶然举动，而是反映了他对史学的深刻认识，他已经从探赜的具体实践上升到有关探赜的理论思考。此外，与刘知幾同时代的司马贞，评介前代的《史记》研究成果，认为徐广、裴骃只是“粗见微意，而未穷讨论”；南齐人邹诞生的《史记音义》“义乃更略”；就连“达学宏才，钩深探赜”的刘伯庄，也“不见旁通”（以上所引见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司马迁：《史记》附录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043~4044页）。总之，前贤关于《史记》的探赜难以令他满意。司马贞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名曰《史记索隐》。可见，司马贞也是一位对“探赜”情有独钟的唐代史学家。

自宋以后至于清，“探赜”一类表述时见于典册之中。《双槐岁钞》记洪武十八年蜀献王朱椿在凤阳，“以读书自娱，阅武余暇，日与儒生探赜经史”（黄瑜撰，魏连科点校：《双槐岁钞》卷二《中都阅武》，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1页）。清人潘耒称赞康熙皇帝“稽古验今，必钩深而探赜，旁罗俯察，每左图而右书”（潘耒：《遂初堂文集》卷四《纂修〈皇舆表〉书成颁赐廷臣谢表》，续修四库全书第14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页）。这些表述，强化了“探赜”与读书之间的关联。

综上，“探赜”既是一个动词，意近于探究、抉发、表微；也可以作为一个动宾结构，表示探究事物之赜，而“赜”即精微、幽隐，一言以蔽之，探求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深意。若从史学的角度来看，探赜即是窥探史心归处，是一种具有思想性、隐秘性和个性化特征的史学鉴赏与对话。

二 探赜的歧途

《史通·探赜》篇首小序阐说探赜的重要性，然后举例批评前代史家孙盛、李德林、魏收等在探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篇末总论探赜之流弊及其危害：“或出自胸怀，枉申探赜；或妄加向背，辄有异同。而流俗腐儒，后来末学，习其狂狷，成其诬误，自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铭诸舌端，以为口实。”（《史通·探赜》，浦起龙通释本，第198页）从文章学的角度来看，全篇结构整饬，有理论也有实例，而其大要则见诸于刘知幾所举证的探赜误区。当然，刘知幾的纠谬也有可商榷之处。如檀道鸾认为习凿齿撰《汉晋春秋》是为了警示桓温篡权，有现实的政治考虑，刘知幾颇不以为然。关于这个问题，明人郭孔延就认为习凿齿“似若有意……道鸾之说，或当有据”（郭孔延：《史通评释》卷七《探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纪昀也说：“定邪正，明顺逆，即以警奸篡，所谓《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也。道鸾论非无理。”（纪昀：《史通削繁》卷二《探赜》批语，上海：扫叶山房书局1926年版，第45页）今人程千帆更直言刘知幾关于《汉晋春秋》的探赜“尚属皮相之谈，未能洞悉习氏微旨”（程千帆：《史通笺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3页）。不过，瑕不掩瑜，这些并不影响《探赜》篇的理论光彩。

郭孔延评论《史通·探赜》时，将刘知幾的批评意见概括为“孙、葛失之迂，犹可言也；李失之诬，檀失之凿，魏失之悍”（郭孔延：《史通评释》卷七《探赜》，第98页）。尽管郭孔延所言不尽准确，如孙盛之说亦可归于诬；葛洪之失未必只是迂。但他所提出的迂、诬、凿、悍，加上刘知幾提及但郭孔延不甚在意的“陋”，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五个探赜误区。这里，以刘、郭所论为主，辅以他说，间附己意，略作申述。

首先说“陋”，指见闻不博、认识不周。刘知幾所举的例子关涉孔子何时作《春秋》。有一种说法认为孔子于鲁哀公十四年“感麟而作”《春秋》。孔子之孙子思则称：“吾祖厄于陈、蔡，始作《春秋》。”刘知幾认为子孙对祖辈之事的记载，定是可信的。“传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为自反袂拭面，称吾道穷，然后追论五始，定名三叛，岂不是‘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所致耶”（以上所引见《史通·探赜》，浦起龙通释本，第195页）。事实上，刘知幾此处举例并不十分得当，因为孔子在何种情境下开始修《春秋》，一直存有争议。司马迁的说法已自相抵牾（参见司马迁：《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第2352页；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4006页）。但刘知幾提出的“陋”，确是探赜中需要避免的问题。评论者掌握的知识越丰富，对细节的认知愈准确，探赜越有可能接近本相。相反，假若连史家的身世、时代和书中所载史事都一知半解，显然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探赜。前辈史家多强调博雅，洵为知言。

其次谈“迂”。“迂”有不切实情、不合情理的意思。孙盛以为《左传》对吴、楚的记载、《汉纪》对匈奴的记述均简略，由此得出二史“贱夷狄而贵诸夏”的结论。刘知幾反驳说《左传》中所载楚国史事不少，且“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而吴、楚两国又“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安能备诸？”何况《左传》还记载了“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鸣，郟子之知鸟职”等“边隅小国”的琐事。《左传》对吴、楚历史的处置实在谈不上贱夷狄。东汉末年荀悦作《汉纪》，主要是抄撮《汉书》而成，“中外一概，夷夏皆均”，也不存在“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史通·探赜》，浦起龙通释本，第195页）。孙盛由怀疑《左传》进而曲解荀悦，实不足取。

再次看“诬”，主要表现为先入为主、虚妄不实。李德林在与魏收论史的书信中说：“汉献帝死，刘备自尊崇。陈寿，蜀人，以魏为汉贼。”（魏征：《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第1196页）陈寿为蜀人是事实，但陈寿是否因感念故国而扬蜀抑魏，却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刘知幾不认同李德林的观点，举证说陈寿评论“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的曹操和“忍害贤良，疏忌骨肉”的曹丕，“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反而对“终始无瑕”的刘备“抑其所长，攻其所短”。这是因为陈寿于西晋撰《三国志》，西晋的正统源于曹魏，故“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在刘知幾看来，李德林关于陈寿史心的探赜乃是“无其文而有其说”的无稽之谈（以上所引见《史通·探赜》，浦起龙通释本，第197页）。如此探赜，于史家本心而言，可谓圆凿方枘，格格不入。

至于“凿”，即牵强附会。刘知幾所举檀道鸾关于习凿齿《汉晋春秋》的评论，在体现“凿”的问题上不够典型，但“凿”确是探赜中常见的现象。孟子早有论说：“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杨伯峻编著：《孟子译注·离娄章句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6页）。刘勰既从文风上批评过“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黷旧式，故穿凿取新”（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定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0页），也从史学上有过深刻分析：“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史传》，第171~172页）。穿凿易与独见混淆，如宋人张耒评司马迁“论管、晏之事，则于晏子独曰：‘使晏子而在，虽执鞭所欣慕焉。’迁之为是言者，盖晏子出越石父于縲紲，而方迁被刑，汉之公卿无为迁言，故于晏子致意焉……至怨时人之不援己于祸，而拳拳于晏子，迁亦浅矣！迁亦浅矣！”（张耒著，李逸安等点校：《张耒集》卷四一《司马迁论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64页）张耒刻意将司马迁对晏子的评价与李陵之祸勾连起来，得出“迁亦浅矣”的结论，看似有新意，实已背离司马迁的史心。“凿”又往往表现为生硬地比附和过度诠释，求之过深而强求其通。用章学诚的论述来疏解，就是“其书初不关乎象数者，必求象数以实之，则凿矣”。又如《孟子》的《梁惠王》与《公孙丑》之篇名，则亦章首字句，取以标名，岂有他哉？说者不求篇内之义理，而过求篇外之标题，则于义为凿也”（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匡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4、406页）。凿之于探赜，危害极大，因为它把心智引入了思考的歧途。

最后论“悍”。“悍”不是字面上的勇猛蛮横或粗暴鲁莽，而是指别有用心、史心不淳。魏收称北魏史家崔鸿“见晋魏前史皆成一家，无所措意”，而刘渊、石勒、李雄等“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焉。鸿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又恐识者责之，未敢出行于外”（魏收：《魏书》卷六七《崔鸿传》，第1502页）。按照魏收的解释，崔鸿是因为祖、父两代曾在刘宋为官，故而不写东晋、刘宋和萧齐。刘知幾认为魏收故意曲解崔鸿作史心曲。“必以崔氏祖宦吴朝，故情私南国，必如是，则其先徙居广固，委质慕容，何得书彼南燕，而与群胡并列！爱憎之道，岂若是邪？且观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亦犹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述孙、刘，皆宗魏世。”魏收之所以这样说，另有隐情。魏收“躬为魏史，传列《岛夷》，不欲使中国著书，推崇江表，所以辄假言崔志，用纾魏羞”（《史通·探赜》，浦起龙通释本，第198页）。浦起龙评论刘知幾“追出诃鸿心曲”，并以为“此一条探出收之议鸿，全是私心造言，尤为最妄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七《探赜》释语，第198页）。浦氏之言深得子玄之心。探赜中的“悍”不只是强加己意，还为了达到

自己的某种目的,歪曲他者,这已经不是知识、能力或见识的问题,而属于心术范畴了。

陋、迂、诬、凿、悍五者之间并非截然不相关联,比如迂和诬、陋和凿之间往往有交集。一次失败的探赜可能既犯下凿的错误,也有陋、诬之病。但陋、迂、诬、凿、悍的基本内涵和边界是清晰的,其所指亦各有侧重。史学家不能不时刻检讨自身智识、处境与探赜对象之间存在的差异或差距。

三 探赜的魅力

既然探赜易于误入歧途,那么探赜是否还有必要?即使如刘知幾这般对探赜的误区了然于胸,也不能全然躲避探赜的陷阱,那么讨论探赜是否还有意义?假如因为存有类似的疑问,而放弃探赜,无异于因噎废食。史学家不能因为探赜可能误入歧途而逃避探赜,因为放弃探赜也就意味着停止了史学的追问与对话。我们并不否认,后来人总是难免从自己的生存境遇、时代氛围、学术偏向和政治需求理解前人。不管是一般的读者,还是专业的评论家,对史学著作的理解很难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穿凿附会,或无中生有,或文过饰非,或强解人意。毫无瑕疵的探赜,恐怕只是一种理想。由此而论,探赜只能是一个理解与误解共生共存的过程。古人不能复起,后人所探之赜是否为古人之真意,往往是一个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结局。面对探赜中的种种争论与分歧,史学家唯有继续探赜而已。这个看似无解的循环,正是探赜的魅力所在。

应当强调的是,即便是不周密甚至有瑕疵的探赜,也有其学术价值。刘知幾以为葛洪对《史记·伯夷列传》和《项羽本纪》的分析,是“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史通·探赜》,浦起龙通释本,第196页)。但葛洪之所以说司马迁“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踞高位者非关有德也”(葛洪:《西京杂记》卷四《司马良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页),极有可能反映了生活于乱世之中的知识人关于善恶与命运、德行与权势的反思,对道德说教的厌弃。魏收对崔鸿的评议,也暴露出他的南北观及其处置对峙政权的历史方式。至于李德林对陈寿的评判,从一个反面说明,在政权交替频繁的时代里,身历数朝的史学家在记述前朝历史时所面临的身份尴尬及因此可能产生的思想误导。葛洪、魏收、李德林的探赜虽可能不尽合乎司马迁、崔鸿与陈寿之心,但却折射出东晋、北齐和隋朝一部分学人的历史观念与史学观念,是人们研究魏晋南北朝至隋时期史学史和思想史不可忽视的重要材料,同样具有探赜的意义。

古往今来的史学家之所以致力于探赜,除了刘知幾强调的“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史通·鉴识》,浦起龙通释本,第189页)和“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失其指归,则难以传授……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史通·探赜》,浦起龙通释本,第194页)之外,从根本上看,探赜所解决的是史学生成与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何以窥见史心,沟通古与今、自我与他者。史心隐于事、文之中,它不会自然呈现,只能通过史家的理解与评议才有机会得见其真。唯有探赜,才能不拘泥于字句,听得见弦外之音;唯有探赜,才能心有灵犀,表史学之微。如果这个说法基本成立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无探赜,则无完整的史学。探赜存在于读史、思考、作史的全过程。《史通》《文史通义》《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诸名著无一不是作者探赜的结晶。正是在这些典籍中,我们看到了生动、深刻、有思想跃动于其间的中国史学。

四 结 语

人们总在尝试与前代史家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以知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史家又是怎样剪裁史料与重现过去的。中国史学史上那些无止无休的争论及其背后的意图,大多可以从探赜的角度予以分析。或许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家探赜史就是中国史学史的剪影。在探赜上多下些功夫,藉此寻觅史心归处,观察史学的发生与延续,聚焦理论的误读与纠谬,提炼研究的原则与方法,或可发现中国史学别样的风景。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史学基本概念与范畴研究”(21AZS002)]

收稿日期 2022—03—10

作者刘开军,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成都,610068。